

从数字排斥到数字包容：民族地区乡村儿童数字文化表达的主体性困境与实践路径

芮铭泽

（西北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甘肃 兰州 730124）

摘 要：随着数字乡村战略与“数智化”建设的纵深推进，智能移动终端与流媒体平台在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全面铺开，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少数民族乡村儿童的日常生活。但当技术赋能成为主流话语之际，正潜移默化地地形塑着乡村社会的文化实践场域，压缩着边缘群体的自主表达空间与文化再生产能力。在可行能力途径、文化自觉与数字包容的复合视阈下，数智时代民族地区乡村儿童主体性面临表达边缘化、自我认同的异化、能动性的剥夺等多重困境。在实践进路上，民族地区要提升少数民族乡村儿童数字文化的实质可行能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数字内容建设，构筑多元互动的数字乡村包容性生态圈的路径解决数字排斥问题。

关键词：数字排斥；乡村儿童；民族地区；主体性困境

DOI：<https://doi.org/10.65196/6sed0t02>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乡村战略与“数智化”建设的纵深推进，我国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少数民族乡村儿童的日常生活，彻底打破了地理阻隔带来的信息壁垒，为他们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数字窗口，提供了接触多元文化、拓展认知视野的宝贵机会。

然而，当技术赋能成为主流话语之际，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逻辑正潜移默化地地形塑着乡村社会的文化实践场域，压缩着边缘群体的自主表达空间与文化再生产能力。数字鸿沟已从传统的“接入鸿沟”转向更为隐蔽的“能力鸿沟”和“使用鸿沟”^[1]。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乡村儿童拿到手机主要用于玩游戏和看视频，只有两成左右的孩子曾想过用数字技术为家乡做些什么^[2]。当前学术界关于数字时代儿童主体性的研究多聚焦于城市大学生群体，对民族地区乡村儿童这一特殊边缘群体的关注相对不足。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描述，缺乏从能力途径、文化自觉与数字包容的复合视域对主体性困境进行系统性分析。如何在数智化浪潮中保护和培育少数民族乡村儿童的主体性，提升其数字文化实质可行能力，构建多元互动的数字乡村包容性生态圈，已成为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理论锚点：能力途径、文化自觉与数字包容的复合视阈

通过引入阿马蒂亚·森的权能视阈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试图搭建一个透视弱势群体数字生存状态的复合型理论框架^[3]。这一框架不仅关注“人与技术”的张力，更聚焦于“文化与共同体”的互构。

（一）可行能力：在少数民族乡村儿童数字表达中的适配性

可行能力理论为理解少数民族乡村儿童的数字困境提供了超越“技术决定论”的分析框架，其核心在于区分“商品拥有”与“实质自由”的本质差异^[4]。智能设备的普及只是数字参与的起点，能否转化为实际的文化表达能力，取决于环境、社会及个人三种转换因子的协同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转换因子普遍存在固化障碍：环境层面，数字基础设施虽已覆盖，但缺乏支持深度创作的专业设备与网络带宽；在社会层面，学校数字素养教育停留在基础操作，家庭普遍缺乏数字引导能力，村落也未形成支持数字创作的文化氛围；个人层面，儿童长期处于被动信

作者简介：芮铭泽（200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乡村振兴。

息接收状态，缺乏数字表达的自信与技能。更为深刻的是，数字文化表达本应是儿童实现自我价值与族群认同的实质自由，但算法主导的流量逻辑却将这种自由符号化、商品化。当儿童的原创内容因缺乏关注度被算法边缘化，而低俗娱乐内容却获得海量推送时，他们的数字表达权实质上被剥夺。这种剥夺不仅限制了个体的全面发展，更切断了民族文化通过年轻一代实现数字化传承的重要渠道，使少数民族文化在数字空间中逐渐失语。

（二）文化自觉：少数民族儿童的主体性表征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为审视少数民族儿童在数字时代的文化身份建构提供了重要视角^[5]。数字媒介的普及为少数民族儿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反思契机，推动他们完成从“自在”到“自知”的深刻转变。在传统社会中，少数民族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大多处于无意识的“自在”状态，文化传承主要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进行。而数字媒介则为他们提供了一面“数字化镜像”，使他们能够以旁观者的视角重新审视本土文化符号。当他们用手机拍摄家乡的非遗技艺、录制长辈的口述历史时，不仅是在记录文化，更是在主动思考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种从无意识生存到有意识反思的转化，正是文化自觉的开端。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儿童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能动性得到了重构。在云端的跨文化对话中，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文化展示者或被观察者，而是能够以平等的身份与其他族群进行理性的文化交流。他们通过数字作品讲述自己的家乡故事，传播本民族的生态智慧与文化理念，同时也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在双向互动中实现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内在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数字包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数字包容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耦合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数字包容的本质是反垄断与反排斥，其目标是让所有群体都能平等地参与数字生活、共享数字发展成果^[6]。这与构筑线上线下相融合、各民族无缝连接的共同体文化空间具有高度的逻辑同质性。当前，技术秩序下存在着诸多隐性区隔，算法推荐机制往往强化了文化差异与群体隔阂，导致不同民族的青少年生活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中，缺乏有效的交流与理解。推动数字包容，就是要打破这些技术壁垒，消除数字鸿沟，为各民族青少年创造平等的数字参与机会。在数字包容的生态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图景能够得到更加生动的呈现。各族青少年在数字空间中既可以充分展示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能够在交流互鉴中发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价值。他们通过合作创作数字作品、共同参与线上文化活动，不断加深对“多元一体”内涵的理解，提炼并凝聚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这种基于数字平台的文化交融，能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成为各族青少年共同的精神追求。

三、数字排斥：民族地区乡村儿童数字文化表达面临的主体性困境

（一）算法中的“符号异化”：少数民族数字文化的符号消费与表达边缘化

一是泛娱乐化消遣的技术规训，使乡村儿童陷入被技术深度驯化的泥潭。从调研情况看，部分乡村学校数字素养教育供给侧存在结构性短板，信息技术课程仍以电脑基础操作教学为主，对高阶数字创作、媒介批判能力的培养有所不足。在家庭监管缺位、学校引导不足的双重困境下，乡村儿童的数字行为不可避免地倾向低阶娱乐活动倾斜。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乡村儿童每天使用手机的主要目的是玩游戏和看短视频，只有不到两成的孩子会用数字工具进行学习或创作^[7]。商业平台流量导向的算法推荐机制，容易捕捉儿童兴趣偏好，持续推送高刺激性、碎片化娱乐内容，部分儿童由此陷入较难突破的“信息茧房”需要家庭、学校、平台多方协同干预引导。赋能机制缺失导致的能动性反噬，加速了乡村儿童个体主体性的消解。数字技术本应成为赋能个体、表达自我的工具，但在缺乏理性引导和系统赋能的情况下，乡村儿童的数字表达往往呈现出非理性、跟风式的特征。他们在网络上的发言大多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情绪化的跟评跟风，或是对网络流行语、热门梗的机械模仿，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分析。

（二）离散自我认同：技术依附下的文化异化与精神脱域

数字技术在打通少数民族乡村信息壁垒的同时，也催生了儿童群体对智能手机的深度技术依附。这种依附早已超越工具使用的范畴，演变为一种全方位的生存方式依赖，并由此引发了深刻的文化异化与精神脱域危机。当数字屏幕成为儿童认知世界的主要窗口、构建身份的核心载体时，

本土文化的根脉被悄然切断，乡村熟人社会的交往根基被逐步瓦解，部分少数民族乡村儿童存在精神脱域、精神漂泊的潜在风险。现代性焦虑与本土文化虚无，是技术依附带来的首要精神困境。智能手机的全天候渗透，使得西方与都市主流消费主义符号以算法推送的方式无孔不入地涌入边远村落。在网络空间部分片面叙事下，儿童每天接触的是经过精心包装的都市生活图景、标准化的审美范式与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而本民族的口头文学、非遗技艺、民俗礼仪则在流量逻辑中被边缘化，甚至被贴上“落后”“土气”的标签。

（三）可行能力的剥夺：从工具性接入到深层“数字排斥”的异化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已基本实现互联网全覆盖，物理层面的“接入鸿沟”正在快速弥合。然而，技术的普及并未带来真正的数字平等，一种更为隐蔽、危害更深的“能力鸿沟”正在形成。少数民族乡村儿童正经历着从工具性接入到深层数字排斥的异化过程，这种异化不仅表现为数字技能的不足，更体现为技术对人的全面规训与主体性的消解^[8]。泛娱乐化消遣的技术规训，使乡村儿童陷入被算法深度驯化的泥潭。当前乡村数字素养教育供给侧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绝大多数学校的信息技术课程仍停留在基础操作层面，完全忽视了高阶数字能力的培养。在家庭监管缺位、学校引导不足的双重困境下，乡村儿童的数字生活被低阶娱乐活动全面占据。这种技术规训不仅大量挤占了儿童的学习时间和现实社交空间，导致注意力涣散、专注力下降等问题，更将儿童的数字身份窄化为被动的消费者，使他们逐渐丧失了对数字技术的掌控力。这种从工具性接入到深层数字排斥的异化，本质上是数字时代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当城镇儿童已经在学习编程、数字创作等高阶技能时，少数民族乡村儿童却只能在算法的投喂中被动消费娱乐内容^[9]。

四、应对方法：民族地区乡村儿童数字文化表达的主体性路径

（一）提升少数民族乡村儿童数字文化的实质可行能力

建立“家乡故事数字策展”的主体激励机制，推动乡村儿童从被动的“景观接受者”向主动的数字文化主体转变。教育部门应当与社会公益组织、互联网平台、高校等多方力量深度合作，搭建多元化的数字创作平台与展示渠道。鼓励乡村儿童运用播客、短视频、微纪录片、数字绘本等多种数智工具，记录家乡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非遗传承人与他们的故事。通过举办家乡数字故事大赛、民族文化数字展等活动，为优秀作品提供线上线下展示机会，并给予适当的物质与精神奖励。这种激励机制不仅能够激发儿童的创作热情，更能让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家乡之美、文化之美，增强对家乡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同时，当他们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时，也能提升其在数字空间的话语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赋权。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数字内容建设

在内容创作供给层面，提炼共有精神符号的数字化表达，在云端绘就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图景。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具有碎片化、去中心化的特点，容易导致青少年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出现片面化、标签化倾向^[10]。因此，必须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财富贯穿于少数民族乡村儿童的数字创作全过程，将其融入校本课程与课外实践活动。要引导各族儿童聚焦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挖掘长征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跨越民族界限的精神内核，通过数字绘本、动画短片、有声故事等形式进行生动呈现；鼓励他们中华诗词、传统节日、中医药文化等共有文化元素与本民族非遗技艺、民俗风情、生态智慧相融合，创作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气息的数字作品。同时，可搭建跨区域、跨民族的数字创作交流平台，组织“中华一家亲”主题数字策展活动，让各族儿童在合作创作、相互欣赏中增进文化认同，深刻理解“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三）构筑多元互动的数字乡村包容性生态圈

激活“学校-村落-家庭”的有形联动空间，让数字技术重回复归村落主体的公共生活。长期以来，乡村数字教育多局限于学校围墙之内，与村落生活、家庭场景相脱节，导致技术难以真正融入儿童的成长环境。依托数字乡村建设契机，应在村落中心区域打造标准化数字化“儿童之家”，配备电脑、平板、录音录像设备等基础数字工具，由学校教师定期驻点指导，同时吸纳村落里的非遗传承人、返乡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兼职辅导员。尤为重要的是，要倡导“身体

践行”的数字实践理念，将数字活动与村落的日常生活、民俗节庆深度融合。例如，组织儿童与家长共同拍摄家庭劳作场景、记录家族口述史，邀请非遗传承人带领儿童用数字手段记录传统技艺的制作流程，举办村落数字文化节展示师生与村民的共同创作成果。通过这种联动模式，学校成为数字技能的传授阵地，村落成为数字实践的广阔舞台，家庭成为数字文化的传承单元，三者形成合力，让数字技术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连接代际、凝聚村落、传承文化的纽带，真正成为村落公共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11]。

参考文献：

- [1] 李三希, 武珣璠, 李嘉琦. 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 时代意义、机遇挑战与路径探索[J]. 经济评论, 2023 (2): 3-14.
- [2] 张帅正, 陈鹏. 数字弱者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及实现路径[J]. 中国远程教育, 2025 (7): 67-82.
- [3] 潘建伟. 阿马蒂亚·森经济学的哲学思想[J]. 商业研究, 2010 (6): 14-17.
- [4] 戚聿东, 刘翠花, 丁述磊. 数字经济发展、就业结构优化与就业质量提升[J]. 经济学动态, 2020 (11): 17-35.
- [5] 周星. 乡土生活的逻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49.
- [6] 封丽.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数字包容服务探析[J]. 图书馆学研究, 2024 (2): 92-99.
- [7] 叶之宁. 视频中乡村媒介景观的建构与重塑[J]. 出版广角, 2022 (2): 74-77.
- [8] 肖坤冰. 主客之间: 电视传媒对四川羌族地区的综合性影响[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8): 171-175.
- [9] 李芳宇, 周乐.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乡村儿童教育产品设计探究[J]. 包装工程, 2020 (16): 154-163.
- [10] 饶曙光.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概念·策略·战略[J]. 当代文坛, 2011 (2): 4-11.
- [11] 张艺婕. 湘西传统村落环境色彩的地域性特征研究[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8.

From Digital Exclusion to Digital Inclusion: The Main Body Dilemma and Practical Path of Digital Cultural Expression of Rural Childre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RUI Mingze

(School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730124, Gansu,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the digital rural strategy and digital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intelligent mobile terminals and streaming media platforms have been fully popularized in ethnic area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penetrated into the daily life of rural childre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While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has become a mainstream discourse, it is subtly reshaping the cultural practice field of rural society and compressing the independent expression space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capacity of marginal groups. From the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f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digital inclusion, rural children in ethnic area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face multiple predicaments in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including marginalized expression, alienated self-identity and deprived initiative. In terms of practical approaches, ethnic areas should improve the substantive digital cultural capabilities of rural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ntent by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 a diversified and interactive inclusive ecosystem for digital countryside, so a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digital exclusion.

Keywords: digital exclusion; rural children; ethnic areas; subjectivity predicament